

“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

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

张 生

内容提要 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世界上第一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堪称“原典”。《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分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历史环境，分屠杀、性暴力、抢劫和破坏四部分阐述南京大屠杀的整体面貌，奠定了中国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叙事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和《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构成了中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早期谱系，体现了原典在时代沧桑中的流变和传承。《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也启发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

关键词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原典 高兴祖 胡允恭

在学术史中，日本学者洞富雄的《南京事件》曾被认为是第一本研究性的南京大屠杀专著。^①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贡献巨大，其作品公开出版在当时已经“遗忘”了大屠杀的日本，意义自然凸显。但“第一本”确非其所为。新近发现的1963年11月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印行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堪称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开山之作。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四位编著者都是日本史小组的老师，分别为胡允恭、高兴祖、吴世民和查瑞珍，高兴祖为组长，另有何杰等七位学生“协助工作”，书稿的执笔和修改“是由教师担任的，其中尤以胡允恭执笔为多”，书稿所有章节“均经参加者反复讨论，并经系内外有关同志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所以可以看成是一部集体作品。初稿完成于1960年，在1962年12月南京大屠杀25周年之际，编著者进行了审订和增补，1963年11月第一次印刷，全书89页。^②

梳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它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原典”，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虽然今天相关史料的丰富程度、研究的问题意识、内容的完备，以及跨学科研究视野的展开，已非半个世纪以前高兴祖、胡允恭等人的先见所能覆盖，但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暴行结构分类、大屠杀规模及其统计路径、大屠杀中中国人的反抗，“大屠杀前史”——时代背景和“大屠杀后史”——南京审判、东京审判等各方面，均可见后人的继承和遵循。当然，从后人对高兴祖、胡允恭等人研究的扬弃和发展，可以看到历史叙述主体和主题、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的时代性变迁。变与不变，不仅无损于原典的地位，反而益增我们对于前辈筚路蓝缕开拓之功的敬意，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学术史的理解。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发现”

后学并非全然无知高兴祖等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努力的线索。张生等人在 2012 年出版的著作中称“1962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写作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刊刻了油印本。”^③徐志民 2017 年亦称“1960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开始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并于 1962 年完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书稿,但直到 1979 年才得以出版。”并称,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南京大屠杀专著”。^④前者的错误其实是把审订、增补时间误植为刊印时间,后者的错误在于 1979 年印刷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仍属“内部资料”,不是“出版”。共同的错误在于书名,这一错舛其来有自,都来源于原著作者高兴祖的记忆。^⑤

按照高兴祖 1979 年的追述,《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⑥“油印本”原有八章,另加“导言”和“结论”,其中,“导言”和第八章“屠杀、强奸、抢劫和破坏的统计数字”由高兴祖本人执笔,第一章“南京沦陷前的情况”和第四章“‘皇军’的兽行”由吴世民执笔,第七章“人民的反抗”由查瑞珍执笔,第二章“南京大屠杀一”、第三章“南京大屠杀二”、第五章“抢劫和破坏”、第六章“‘安全区’并不安全”和“结论”由胡允恭执笔。1962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时,他们将“南京大屠杀”扩大为三章,“‘安全区’并不安全”改为“难民区真相”,“人民的反抗”改为“永不屈服的人”,“结论”改为“余论”。^⑦高兴祖所说的“油印本”当属原典之前世,今天尚未发现;从 1963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刊印之成书《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看,“导言”消失,“余论”为第十章,另加了“后记”,就分工看,胡允恭执笔篇幅最大。

笔者获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原始印本,正是胡允恭本人题签的,收藏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张成德 2018 年转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大本”,以区别于高兴祖本人题签的“纪念馆本”),他约于 1980 年在扉页前另加书封,交代此书的由来说:

此书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胡允恭教授所

送,当时予在军旅,胡师邮寄来。

南大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由当时的讲师高兴祖牵头,胡师亦小组成员。胡师虽为教授,但由于“历史问题”受打击、批刺,不为重用。文化大革命后得以平反——原来胡师早年参加革命,与瞿秋白等熟悉,土地革命时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80 年予工作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曾往看望,他以回忆录《金陵丛谈》相赠。^⑧

胡允恭本人的题签,对说明此书编纂的缘起,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写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早成为历史上专有的名词。一九六〇年南京大学少数同志为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总结了这一惨痛的历史,写成专书,即命名为《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书的字数虽不多,但它叙述了血淋淋的轰动世界的大事件!江苏人民出版社认为是永久性的作品,决定印出,公之世界。”他特别说明了此书正式出版一再延宕的原因“近年因反修,照顾政策,出书日期,一再延后。本年秋已经校对完毕,排印出书,嗣又考虑再延。惟因内部需要,所以先把样本装成十余册,以便参考,对外不公开。希少数读者注意为荷。”^⑨《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和中苏争执,是深刻影响二战后世界格局、特别是东亚局势的大事,其冲击波及一本著作的出版,虽出意料之外,却也通透地点明了本书的“时代背景”。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资料来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献资料,来源于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报刊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笔者按:此即为今天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华日报社、南京市文化局、南京地志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室;二是口述资料,其时幸存者尚多,调查者称,“特别在访问过程中,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述及当日情况时,往往声泪俱下,使我们深受感动,推动了我们的工作”^⑩。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虽然没有对外公开出版,但其内容并不是始终处于秘密状态。日本史小组称,“为了向希望了解这一事件的日本朋

友介绍情况，一九六五年，我们向有关外事单位提供了全部研究成果和照片，在这个基础上，为日本朋友举办了报告会和照片展览。此后，我们还多次应邀参加这类接待活动和向日本某历史学家提供材料，日本朋友听过介绍以后的激动心情，和纷纷表示一定要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决心，使我们非常感动，至今还难以忘怀。在国内我们曾向许多单位提供了这一著作的油印本，或提出有关报告，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高兴祖还提到，相关内容曾在1963年和1978年提交给南京大学校庆科学报告会。^⑪高兴祖的这段追忆说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除了出版规范意义上的“公开出版”，它其实早已扩散，甚至“国际化”。只是在记忆和遗忘的反复搏斗中，它一度湮没，以至于作者本人都记错了它的名字。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七七”卢沟桥事变、尤其是上海“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今天几乎所有南京大屠杀史论著的起点，《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第一章“南京沦陷前的情况”首开其端。著者首先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正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⑫，“国民党卖国政府”虽然被迫起来抗战，“然而自始至终都准备着妥协投降”。这就造成了江南大片土地被日军侵占的结果，而在从苏州、无锡、镇江冲向南京的过程中，日军即已开始烧杀淫掠。著者在这里引用的是英国记者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但当时未详田伯烈一书资料来源。“南京沦陷前的情况”接着说明：在此之前，日机对南京进行了轰炸，国民党政府在11月20日发布迁都重庆宣言，各机关相继撤离，南京留下“无依无靠的老百姓”，著者准确地指出战前南京人口即达百余万^⑬，战火中他们顶多投奔四郊，“广大居民是无法远走他乡的”，加上各地逃来的难民，南京居民人数众多，“蒋介石集团”对其采取“任其所之”的态度，而“一些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在南京成立“国际委员会”，划定一些区域为难民区。^⑭著者简述了南京保卫战的情况，指出守军司令唐生智的拙劣战术和仓皇撤退命令，随即

开始南京大屠杀主体部分的论述。

1. 关于屠杀

屠杀部分分为三章，其（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两条血路”，分别叙述了1937年12月13日、14日发生在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两旁街巷的针对难民的屠杀；第二部分则以“沿江惨杀”叙述了发生在下关和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观音门的屠杀；第三部分以“环城惨杀”叙述了发生在紫金山、雨花台、汉西门外、上元门、和记公司和凤凰街上新河的屠杀。^⑮

其（中）”则列举了五种特殊的屠杀方式和“运动”：“清街运动”指12月下旬对店员、居民的屠杀，文中引用了编著者寻访到的、曾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协助西方人士工作的幸存者许传音^⑯的证言。“杀人游戏”列举了烧死、淹死、用硝镪水浇死、破腹刺死胎儿等残酷的杀人手段。“明令鼓励杀人”说明在日军司令部明令之下，日军肆意扩大范围，将很多青壮年“指为官兵和抗日分子”逮捕杀害。“杀人竞赛”引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大阪每日新闻》报道，介绍了片桐部队的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之（笔者按：今一般作野田毅）的杀人竞赛。“实验细菌和宪兵杀人”特别引用了当时有机会接近日军医务机构的台湾人谢金龙的报告，揭露日军俘虏收容所的所长森田中尉，“奉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第三课长广本上尉的明令，挑选百余名俘虏到中山门中央医院旧址，交多摩部队供细菌试验，把各种病菌注射到较强壮的俘虏身上，观测变化，结果在数天内，百余人全部死亡”。文中还介绍了日军宪兵杀人的情况。^⑰

其（下）”集中讨论了当时南京的尸体处理问题，其中“路旁的尸堆”介绍，为方便日军“高视阔步”，日本大使馆指派安村三郎加入国际委员会并与其交涉，由红卍字会、崇善堂等民间慈善团队和部分难民组织收埋队处理尸体，文中还引用了当时尚健在的原红卍字会会长杨登瀛的证词。“双龙巷、石婆婆巷的尸架和二条巷口的尸山”介绍说，鼓楼一带日军屠杀人数众多，“这一地段，路面狭窄，尸体、杂物特别多，只好把一部分尸体搬运到附近双龙巷中，沿着巷的两壁迭起来，这两

条巷子恰巧又极狭小,两边迭起尸体,简直变成尸架或肉壁了”。“另一部分积尸,被清除队运到二条巷口大北山的西面脚下,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地,尸体可以任意扔弃,因此运来的尸体甚多,后来被日寇运走一部分到五台山(现在已开辟为江苏体育场)上浇上汽油焚烧灭迹,仍有一部分留在原处……所以居民称做尸山。”“积尸的掩埋和焚化”说明,1938年1月间,南京大屠杀被中外媒体报道后,日方承认在南京有屠杀等行为,将松井石根等调回国内。南京警备司令谷寿夫等命令迅速处理尸体,一方面由收埋队草草掩埋,一方面由日军进行焚化,终于大致处理完毕积尸。^⑮

2. 关于性暴行

这部分,分“普遍的强奸”和“谷寿夫等高级军官的奸淫罪行”两目。著者提出,对于普遍的奸淫,“日寇将领不仅不加约束,反而予以纵容。日寇将领想借此满足士兵一时的兽欲,使其士兵‘得乐且乐’,不至思乡逃亡或竟至发生反战心理”。强奸针对幼小至9岁、年长至75岁的女性。著者当时获得一位被害妇女的控诉材料,“这个女同胞原住在铜银巷六号,与其他几个妇女被日寇架去城中某处,白天洗衣服,黑夜遭强奸。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十次到二十次;年纪较轻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被轮奸的次数则更多”。家属干预的,多被杀死;强奸之后,妇女多被杀害;反抗者,更被虐杀。

著者指出,日军各级军官亦犯下性暴行,谷寿夫本人在中华门、赛虹桥、黄泥塘等处先后强奸妇女数人。日军还掳掠妇女设立“行乐所”或“俱乐部”,进行体制性施暴。^⑯

3. 抢劫和破坏

文中分为“有计划有领导的抢劫”和“有计划有领导的破坏”两部分,而且是相互关联的。

抢劫商人的财物集中在新街口、太平路、建康路、夫子庙、中华路等繁华路段,“这种抢劫是有组织的,大都由长官率领一群全副武装形同盗贼的‘皇军’,驾着大卡车、汽车,直接开到大公司、大商店门前,蜂拥而入,由长官指挥,不问什么货物,一律搬上卡车、汽车,呼啸而去”。而抢劫居民的财物,日军“什么东西都要,只要是抢劫到手

的东西,不问布匹、衣服、脚踏车、箱子、金银、手表等,都可以取得日军司令部许可,发给证明文件,公然带回或寄回国内,交与他们的父母、妻子们享受”。抢劫的同时,杀人放火强奸。

“抢劫了的店铺和仓库,经常是放一把火把它烧掉。”文中引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全市的三分之一都被毁了。”日军还轰炸永利铔厂,占领后更杀害厂中工人,运走其机器。江南水泥公司和中国水泥厂亦被其侵占。“南京城内和四郊,经过日寇的抢劫、破坏,满目凄凉,直到解放前,还没有恢复。”^⑰

4. 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数据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被害人数为二十万,是取最保守的数字。在国民党政府公布三十余万数字的同时,国民党首都地方法院公布了一个《敌人罪行调查统计表》,以日寇驻南京的部队为单位,罗列所犯罪行,作为具体的证据(见表1)。其后,在公布三十九万时,未提出具体证件(笔者按:原文如此,当为‘证据’),五十万更只是估计数。因此,由于三十万的数字比较具体,常为一般人所引用。如解放初期,南京《新华日报》的记者还以《南京屠杀三十万》为标题。”^⑱著者根据当时他们找到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处的档案,提出“有案可考的达四十万以上”^⑲。

关于性暴行受害者数字,著者引用了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提出的数字,即约二万件。同时认为,“这实在是大大缩小的数字”^⑳。关于战事造成的损失,文中引用了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特(笔者按:Lewis S. C. Smythe,今译为史迈士)博士1938年8月调查所得数字“二万四千六百万”,认为数字“不能认为是完备的”^㉑。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余论”揭示了写作此书的宗旨在于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它指出“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正反映了‘皇军’的本质,更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日寇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所犯下的罪恶,都是日寇最高军事领导集团的意旨。”但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以后,没有走上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

道路，而与美国结成了军事同盟，战犯们纷纷充任政府和军队高官，“日本又重新向侵略旧路上迈进”。“余论”回顾了岸信介政府和池田勇人政府的“翻案”言行，提出，美国“欲起用它所一手扶植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充当它侵略亚洲的主要帮凶，而日本军国主义也自以为羽毛已丰，蠢蠢欲动”。但“无论美帝国主义，还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把历史车轮从20世纪60年代倒转到30年代，这不过是愚蠢的妄想。中日两国人民和全亚洲的人民，绝不允许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这条老路”^{②5}。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流变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不是秘密，“但长期以来，没有能公开出版”^{②6}。1979年，在原有章节的基础上，“根据新收集的材料和各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由高兴祖进行了修订、补充，“个别章节进行了改写”，并补充了部分照片，以《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为书名，印行了“内部资料”。^{②7}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序言中，明确了战争和屠杀的责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屠杀，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罪行，和广大日本人民是完全无关的。……正是这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断送了日本人民的民族独立……总结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正是为了吸取教训，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序言还提到了作为日本学界先行者洞富雄的《中日战争史资料》第八卷《南京事件I》和第九卷《南京事件II》的出版及其价值。^{②8}全书110页，《序言》回顾了1963年版本的来龙去脉，说明修订旨趣；《后记》则说明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编纂情况，未编页码。

1979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正文分为“南京沦陷前的情况”“南京大屠杀”“‘皇军’的兽行”“抢劫和破坏”“难民区真相”“永不屈服的人”“屠杀、强奸、抢劫和破坏的统计数字”和“驳斥所谓‘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谬论”等八章。可以看出，“南京大屠杀”又集中为一章，新加了针对日本右翼分子铃木明否定南京大

屠杀谬论的一章，这是在《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中没有出现的新的问题意识。

1979年版本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做了一些修改，如“南京沦陷前的情况”删除了1963年版本中“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正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的说法，“一些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在南京成立“国际委员会”的提法，改为“一些美、英外籍人士以‘热心公益’为名，建议在南京成立‘国际委员会’”。^{②9}

但总的来讲，除新增的第八章外，其余在修订时非常节制。如第二章“南京大屠杀”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上）、（中）、（下）“三章合并为一章，其子目未做变化，仍为“两条血路”“沿江惨杀”“环城惨杀”“清街运动”“杀人游戏”“明令鼓励杀人”“杀人竞赛”“实验细菌和宪兵杀人”“路旁的尸堆”“双龙巷、石婆婆巷的尸架和二条巷口的尸山”以及“积尸的掩埋和焚化”。其文字细节仍从前书，甚至标点，如“日本人民早已在日本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这时更痛恨日本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行为，于是，日本人民反战情绪日渐高涨。日本反动统治集团：内阁、参谋本部、陆、海军省（部），才开始慌张起来，不得不承认日军在南京有屠杀和奸淫、抢劫、焚烧、破坏等等罪行”等的表述。^{③0}

高兴祖1979年的修订详情，具体地体现在《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本”中，其注释的重新排序用红笔标出，重写的内容用稿纸别在书边，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

就其内容而言，是《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李生姊妹篇，其第八章体现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焦点的转移，但整体上尚未实现破茧而出的飞跃。

1985年，高兴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题学术著作。全书115页7万字，收入“祖国丛书”。第一次印刷即达34000册。^{③1}

《日本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设“前言”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南京‘安全区’的出现”“南京的失陷”“日军对难民和俘虏的大屠杀”“‘难民登记’的骗局”“杀人游戏和杀人竞赛”

“尸体掩埋和被屠杀的人数”“日军的兽行”“抢劫和破坏”“人民的反抗”“应得的惩罚”等11章,以及“附录 大事年表”。其内容和旨趣发生了巨大的跃迁,即从高兴祖负责的集体著作到高兴祖个人著作的转变,新见迭出。

如其《前言》称“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一场外祸。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山河破碎,中华民族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和凌辱。惨痛的历史告诉人们,‘落后就要挨打’。重温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激发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振兴中华,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化而发愤图强。”^②这里,已经脱开了《日美安保条约》和反修概念的羁绊,开始了其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和追求,形成对1963年和1979年版本的扬弃。

又如在讨论南京保卫战之前,高兴祖用专章讨论了南京“安全区”成立的过程。相应的专章在1963年版本和1979年版本中,均为“难民区真相”,而且其立意是揭露“真相”——其结论是:“帝国主义分子办的所谓难民区,不过是个骗局而已。”^③既是“骗局”,对中立国人士在南京开展的人道救援活动,评价自然极低。1985年版本客观描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立过程,厘清了委员会中15个外侨的姓名和身份,记述了梅奇(笔者按:John Magee,今译马吉)牧师主持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与委员会的合作,还提到了《纽约时报》记者都亭(笔者按:F. Tillman Durdin,今译德丁或杜丁)和派拉蒙公司摄影师孟根(笔者按:Arthur Menken,今译孟肯)。高兴祖介绍了南京安全区的位置、面积及其与上海法国神父饶家驹斡旋的关系,中日双方对安全区的态度,南京沦陷后安全区的收容量,而且明确安全区内暴行的责任在于日军。^④语言学术、中性、平和,开创了对于南京安全区经久不衰的学术研究。

再如涉及大屠杀整体状况时,高兴祖指出,日军占领芜湖、突破乌龙山炮台后,将中国军队团团包围,“结果,十几万中国守军只有几千人得以慌忙渡江撤退,其余的都被日军捕杀”^⑤,从而说明了日军大屠杀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中国守军被屠杀的规模在前述两书中均未明确。他系统引用了

受害者、加害者和第三方目击者的资料,比前述二书更为全面、精当,有些资料,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资料^⑥,今天反而罕见引用。在述及“百人斩”竞赛时,新增了前述二书没有的田中军吉屠杀300余人内容。^⑦关于大屠杀规模,《日本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将其确定为三十万。^⑧

新设的“应得的惩罚”一章,专门介绍了战后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证据体系,和对松井石根不作为罪责的界定。还介绍了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等人的审理过程。^⑨内容虽然简略,但开了对两场审判进行学术研究的先河。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从1985年版本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1963年版本和1979年版本的传承。这种传承,不仅体现高兴祖个人的贯穿作用,也说明上述三书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谱系。其中,有关南京沦陷后当地军民反抗的内容,可以清晰看到记忆基因的内核。如前所述,1962年修改《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油印本”时,将“人民的反抗”改为“永不屈服的人”,1979年版本,仍为“永不屈服的人”,到1985年版本中,又改回“人民的反抗”。章名反复,而内容一贯:首先介绍南京工人阶级代表梁志成拒绝开车为日军运输子弹而英勇牺牲的事迹,然后叙述南京女性李秀英不愿受辱,与日军搏斗、多处受伤、胎儿流产的传奇,三个版本都记述了有人在南京新街口放了收音机播放中国的抗日消息、日军屠杀俘虏时中国军人高呼“夺枪”等故事,结尾都指出,新四军领导的游击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一些字句,可以明显看到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二十多年间已经固化了的记忆的延续。如关于李秀英受伤的情形,1963年版本作“李秀英的脸部肿胀得象一张血盆,头发也一根根地竖了起来”,1979年版本同1963年版本;1985年版本作“李秀英的脸部肿胀得象张血盆,头发也一根根地竖了起来”^⑩。高兴祖沿用日本史小组当年的说法、写法,有一个重要背景:“嗣后,由于工作需要,许多同志转向其他教学和研究工作,只有个别同志仍把这一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进一步收集了有关材料。”^⑪

余 论

《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后世的研究者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背景,才能对相关内容有“同情之理解”。如日军以搜查“残败兵”为名在安全区搜捕青壮年时,曾谎称出去登记即有工做、有房子住,否则处决。包括安全区外侨在内,不少人轻信了此言。《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记述了一个南京工人的控诉,说他的朋友“戴大毛”也跟着出去,差点被杀,侥幸逃脱后戴大毛说:这不是美国鬼子点名,让日本鬼子来屠杀吗?^⑫

尽管有这样明显带着时代烙印的瑕疵,《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及其孕育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和《日本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开创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这一影响深远的研究领域。其突出影响有二:

第一,开创了中国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的基本叙事结构。从时代背景到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安全区,分屠杀、性暴力、抢劫和破坏等部分对南京大屠杀整体面貌进行把握,强调大屠杀期间中国军民的反抗,叙述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厘清的事实和责任,这一由上述著作奠定的叙事格局,其影响体现在此后多种研究著作中。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⑬、2012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全史》^⑭篇幅巨大,资料丰富,观点创新,非《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所能望其项背,但叙述南京大屠杀主要组成部分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南京大屠杀史研究》^⑮和《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⑯是专题性研究,国际化视野突出,跨学科特征明显,但在涉及南京大屠杀具体历史过程时,也受到上述叙事格局的影响。

第二,提示了相关资料的收集路径。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方为受害者中方、加害者日方和第三方。《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等三书,没有明确这样表述,但其资料运用,在当时艰难竭蹶的情况下,已经注意到了三方资料的同时呈现。集大成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⑰汇集了中、日、英、美、德、丹、法、意、俄等国的资料,其顶层架构也是三方资料均予客观揭示的原则,达到了新的

高度。新近陆续发现的克拉档案、哈佛燕京费吴生档案和瑞典文档案,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学者搜集三方史料的努力。值得提及的是,《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资料论述日军大屠杀的另一种形态——“试验病菌”^⑱,今天仍值得后学追寻。

然而,《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影响不止于此。

如前所述,高兴祖在《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后记”中提到1965年接待日方人士一事,实际上是当年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南京。接待中,南京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代表团详谈了南京大屠杀^⑲。汪良提到,1937年12月13日,日军冲进南京中山路和中央路,屠杀难民:

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有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过中央门三公里的一条马路)。……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⑳

汪良的这一说法,可以对照《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相关部分:

经过十三、十四两天的大屠杀,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两旁的街巷,都成为血路、血窟。^㉑

“血的马路、血的洞窟”,其实正是“血路、血窟”的中文日译,也就是说,汪良是根据《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相关部分向日本人士介绍南京大屠杀的。不仅如此,发生在中山路、中央路的屠杀十分严重,因而被称为“两条血路”,这一源自《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第二章第一目(详见前文)的提法,在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者洞富雄的著作中被沿用了,而且认为,“‘血路’,不像汪良所说的那样只有两条”^㉒。可见其跨越国界的影响是实际发生的。

高兴祖还提及向“日本某历史学家提供材料”,该“历史学家”据洞富雄著作推断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新岛淳良。新岛作为当时日本著名

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次访问中国,并访问过南京,从南京外事人员那里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情节,发表了多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洞富雄写到:

新岛淳良从南京涉外人员中听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城南光华门逃出后为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慈善团体所收容的一万七千名难民,在那里被就地枪杀(《夺去三十万生命的“南京事件”》,《东风新闻》,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号)。^⑤

如前所述,南京外事人员以《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为介绍南京大屠杀的张本,而日本史小组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群体,高兴祖等人为新岛淳良提供资料的逻辑极为自然。可以说,《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也启发、影响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这颠覆了过往的学术史认知。

①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几个问题》(《史林》2010年第4期),原文以“全世界第一位研究者洞富雄”为题,指出“洞富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字第一篇发表于1967年《近代战史之谜》之一章),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在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洞富雄的《南京事件》出版于1972年,是第一本研究性的专著。”高兴祖说:洞富雄“一九六七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第8、9卷《南京事件》I、II(河出书房新社)……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他又立即于同年十二月出版了定本《南京大屠杀》,对‘虚妄’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洞富雄的定本《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真相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高兴祖《南京大屠杀是确凿的历史事实——代译序》,〔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毛良鸿、朱阿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南京大屠杀之后,蒋公毅、郭岐等幸存者均有记述,但性质为日记和回忆,亦即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资料”。《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1938年出版*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中文版译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其资料系金陵大学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为其提供的史迈士信件、栖霞山报告,魏特琳日记,马吉、福斯特和威尔逊尚未打印的新闻报道稿以及费吴生和贝德士的信件,见Bates to Timperley (March 14, 1938), RG10, Box4 Folder65, *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其成书亦属相关资料的编辑整理,尚未进入“研究专著”阶段。

②⑩《后记》,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1963年11月,第89、89页。

③《导论:学术史》,张生等《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④徐志民《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来自中国学界的观察》,《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期。

⑤1979年3月,高兴祖在《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的《后记》中称,该书“是一九六二年南大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写的。参加的教师有高兴祖、胡允恭、吴世民、查瑞珍四同志,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是高兴祖同志,另外还有七位同学协助进行了调查工作”。见日本史小组《后记》(1979年3月),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国营沙洲印刷厂1979年9月印刷。笔者使用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为高兴祖本人1979年题签的版本。

⑥1979年,高兴祖在《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序言中追述往事时,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误记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见《序言》(1979年3月26日)(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国营沙洲印刷厂1979年9月印刷,第1页)。值得提及的是,虽有时日久之故,但高兴祖本人本有机会对照原作——2002年,其子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转赠了有高兴祖本人题签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以下简称“纪念馆本”)。这一误记,因《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收藏甚广,而成为前述众多错舛的来源。

⑦⑪⑫日本史小组《后记》(1979年3月),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国营沙洲印刷厂1979年9月印刷。

⑧张成德题记,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著《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1963年11月。

⑨胡允恭题签(1963年12月),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著《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1963年11月。

⑫这一论述,对照胡允恭题签中的“反修”,可知乱云飞渡之际时人之为难。

⑬南京战争前后人口,久为日本右翼关注,作为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突破口。如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称“在一个比东京世田谷区还要狭小的地方,在一个当时总人口约20万、而且还有欧美人士混杂其中的地区,居然有数十万人遭屠杀,这种说法本身就令人喷饭”〔日〕渡部升一:《读〈“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有感〉》,载〔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内部读物),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世界知识

- 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 页。田中正明也是这样的看法,见 [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内部读物),第 40 页。松村俊夫说“从当时南京的人口支那军兵力的总数来看,在南京市内外屠杀了 30 万是不可能的。”见 [日]松村俊夫《南京大屠杀大疑问》,赵博源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8 页。这种思路,实际上来源于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武藤章的辩护律师冈本正一对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的质证,见《威尔逊的证词与回答质证》,杨夏鸣编《东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7 册,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1~53 页。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学术界对战前南京人口进行了详细研究。
-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著:《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1963 年 11 月,第 5~6、7~13、14~23、24~27、28~33、34~39、60、74、77、79、82~87 页。
- ⑯笔者按:许传音战后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 ⑰㉔《序言》(1979 年 3 月 26 日),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国营沙洲印刷厂 1979 年 9 月印刷,第 1、1~2 页。
- ⑲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国营沙洲印刷厂 1979 年 9 月印刷,第 3~9 页。
- ⑳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国营沙洲印刷厂 1979 年 9 月印刷,第 10~30 页。引文见《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第 29 页《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第 26 页。
- ㉑高兴祖《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㉒《前言》,高兴祖《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 ㉓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著《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1963 年 11 月,第 50 页;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国营沙洲印刷厂 1979 年 9 月印刷,第 58 页。
- ㉔㉕㉖㉗㉘㉙高兴祖《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12、14、35、47~53、68、96~105 页。
- ㉚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著《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1963 年 11 月,第 53 页;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国营沙洲印刷厂 1979 年 9 月印刷,第 62 页;高兴祖《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3 页。
- ㉛日本史小组《后记》(1979 年 3 月),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高兴祖在 1979 年后系中国重要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开拓者之一,担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第一任会长。胡允恭 1991 年去世,其《金陵丛谈》涉及许多民国政潮、学潮秘辛;查瑞珍淡出相关研究,退休颐养;吴世民则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最后一批资料时,参加了笔者主持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南京大屠杀文献的翻译工作,2018 年去世。
- ㉜㉝㉞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著《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1963 年 11 月,第 45、20~22、8 页。
- ㉟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
- ㊱张宪文主编,张连红、王卫星副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上中下),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 ㊲张生等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下),凤凰出版社 2012 年版。
- ㊳张连红、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 ㊴张宪文主编,张生、张连红、王卫星、杨夏鸣等副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 卷),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2005~2010 年版。
- ㊵[日]洞富雄《決定版・南京大虐殺》,(东京)德间书店 1982 年版,第 18 页。译文参照中译本第 16 页。
- ㊶[日]洞富雄《決定版・南京大虐殺》,(东京)德间书店 1982 年版,第 27 页。译文参照中译本第 28~29 页。
- ㊷[日]洞富雄《決定版・南京大虐殺》,(东京)德间书店 1982 年版,第 28 页。译文参照中译本第 29 页。
- ㊸[日]洞富雄《決定版・南京大虐殺》,(东京)德间书店 1982 年版,第 46 页。译文参照中译本第 57 页,但中译本把“红卍字会”误植为“红十字会”。

作者简介:张生,1969 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暨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潘 清)

(6) Digital Biopolitics in Age of Intelligence

Lan Jiang • 119 •

In 1976, Foucault described the concepts of bio – power and biopolitics in his lectures held in France College, which is against the concept of discipline. The next year, he argued that there is a system of security beyond discipline, which is not based on the disciplined individuals, and the system is new formation of biopolitics. However, the new system didn't show its complete formation in Foucault's era. In current intelligence 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 can afford a realized formation for Foucault's description. The new formation is digital biopolitics, which is based on the algorithmic governance of data mining and refining, and can exactly manage every individuals, with no need of the individual in a unified norm. This governance effectively controls the diverse action and thought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data – internet.

(7) Farewell to Adversary Model: Post – Humanist Reflection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u Guanjin • 128 •

From AlphaGo to Westworld, the adversary model of human vs AI, predominates the discussions across the contemporary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It is this model that opens up various prospects of “Robopocalypse.” In recent years, robopocalypse received politico – philosophical confirmations: AI will “end” human politics (human civilization). Employing actor –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anthropocentrism which dominates the existing studi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the ways AI (as actor) affect human politics. Rather than depicting (hallucinating) Robopocalypse brought by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we have already been living in dromocracy brought by narr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total empowerment” in various social fields, AI as intervener has rapidly rendered human beings severely marginalized. The humanist (anthropocentric) era with which we are familiar (embrace or criticize) is approaching to an end.

(8) On Institutional Supply – Side Reform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on under Rule of Law

Mo Liangyuan • 162 •

The revision of *the Legislation Law* further clarifies the authority and scop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and determines the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capacity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In practice,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 side reform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decision – making behavior of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democratic decision – making, scientific decision – making and procedural decision – making.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of relevant local governments, it is found that while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y are also faced with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Based on this,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 side reform of local government can explore the way of practice in such aspects a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matching of local legislative capacity, recognizing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situation with wisdom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ing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latform elements.

(9) The Construction, Narr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Starting from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Nanjing Massacre*

Zhang Sheng • 197 •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Nanjing Massacre compiled in 1963 by the Japanese History Group of Nanjing University is the first monograph studying Nanjing Massacre world – widely, and it could therefore be considered as the “original text.” The book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pecific environment of the time when Nanjing Massacre happened, and introduced the whole event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massacre, sexual violence, looting and destruction. It thus established the basic narrative structure of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ese academic field. Based on this study,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Nanjing Massacre* and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 Nanjing Massacre* composed the early knowledge pedigree of the Chinese studies of Nanjing Massacre, which also showed the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original text as time passed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Nanjing Massacre* not only deeply influenced the related studies in China, but also inspired the early studies of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10) House – for – Pension: Experiences, Dilemma and Prospects

Wang Yake Ye Yutong Tang Sheng • 240 •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re are more real estate in the asset reserve of the elderly, but less cash savings, which provides a potential development space for housing pension. Due to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practice, the enthusiasm of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s not high, China's housing reverse mortgage endowment insurance is facing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HECM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housing reverse mortgage project with the highest market shar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rovides insurance guarantee mechanism, the market operation of loan institution is relatively mature, and relevant legislation is relatively perfect. In China, increasing the system supply of the government, encouraging vario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forms,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ousing reverse mortgage endowment insurance.